

侨乡研究

海外华侨华人、侨乡社会与跨国宗族实践^{*}

——以广东五邑侨乡薛氏为例

黎相宜

(中山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侨乡研究; 五邑侨乡; 跨国实践; 宗族研究; 宗亲会

〔摘 要〕论文以旧金山、香港与广东五邑侨乡坎镇的薛氏宗亲会及其相关组织为重点, 从互补与竞争的视角, 探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薛氏宗族及其宗族成员在一个跨国空间内展开的宗族实践, 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宗族实践的发生机制、发展过程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以回应传统宗族研究遗留下来的争论。由于海外侨资与声誉资源的稀缺, 合作、竞争与矛盾始终存在于宗族内部, 这种互补与竞争既是跨国宗族内部出现的不同成员及组织的经济与社会分化的产物, 也进一步成为维持与加强跨国宗族形态的不同区域、国家的宗族成员及组织对于宗族的归属感与向心力的重要动因。正是在这种既有同盟又有竞争的错综复杂的宗族网络中, 侨乡宗亲组织以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宗亲组织及其个体才得以呈现出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跨国宗族实践。

〔中图分类号〕D6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6)01-0055-09

Overseas Chinese , Qiaoxiang Association and Transnational Clan Associati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Xue Clan in Wuyi Qiaoxiang , Guangdong

LI Xiang-y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Sun Yat-sen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275 , China)

Key words: Qiaoxiang study; Wuyi Qiaoxiang;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clan studies; clan associations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focused on Xue clan association in Kan town of Wuyi qiaoxia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 San Francisco , and Hong Kong 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associations. It analyzes clan association's practices by the Xue clan association members in a transnational setting and examines its origin ,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s. There are not only cooperation but

〔收稿日期〕2015-09-06; 〔修回日期〕2015-12-11

〔作者简介〕黎相宜, 女,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研究、侨乡研究、国际移民。

^{*} 本研究受到 2015—2017 年度中国侨联课题“广州珠江华侨农场归难侨群体的多向分层融入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15CZQK21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特别委托项目“广州新移民与侨乡社会的互动”、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的资助。

基于研究伦理, 本文所涉及的县及以下的地名、姓氏人名、宗族堂号、社团名、学校名、侨刊名等均做了匿名化的处理。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文责自负。

also competi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within clan association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capital and reputation from overseas Chinese. This is because of the diverse background of the clan association member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ocial disintegration. It also becomes incentives for maintaining and strengthening transnational clan association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and enhancing the members' clan identity.

一、引言

宗族历来是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讨论的经典课题。学术界曾经为此集中讨论过维系宗族的因素和基础。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族产所形成的经济吸引力是维持宗族成员归属感的关键。^[1]此后许多学者围绕他所提出的宗族范式(the lineage paradigm)进行讨论,^[2]尤其是由族产引发的对宗族内部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分化的争论。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宗族能够维系地主士绅的社会地位,但自耕农则不需要宗族。^[3]弗里德曼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在宗族的框架下,富人会捐献族产、兴办公共福利而使族人从中得到益处从而缓和阶级冲突。^[4]

弗里德曼及其后续的研究者对宗族的讨论还局限于相对封闭的中国传统社会。而在当今背景下,宗族内部由于人员、信息、货币、观念、价值的跨界流动形成了多重网络,在这种跨国网络的支撑下,宗族已经演变成具有跨越地域与国界的开放、多边、流动的组织形态。因此,有学者指出,应将宗族放置在全球化、跨国主义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5]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由于拥有众多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台乡亲,不少活动在吸引侨资的名义下以传统文化的合法身份出现,从而带动了宗族组织以及宗族活动的兴盛与发展。这种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6]还有一些研究聚焦于宗族在海外的重建与发展。不少学者就海外宗亲会以及同姓团体的历史形成、组织运作、社会功能、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了研究。^[7]上述讨论验证了宗族在全球化、现代化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有关宗族研究所遗留下来的争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很多海外宗亲会与家乡宗族的成员关系更为多元与复杂,成员之间的互动更多依赖于多重网络的支撑,宗亲会的运作呈现跨国化、网络化的特征,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形态,笔者称之为“跨国宗族实践”。这些跨国宗族实践究竟为我们理解原有的宗族研究范式以及存在的争论提供了哪些新视角呢?以往研究对此的讨论并不充分。比如,构成跨国宗族形态的不同区域、国家的宗族成员及组织如何维持对宗族的归属感?跨国宗族内部是否会发生弗里德曼与费孝通所关心的经济与社会分化?这种向心力与地位分化又是如何进一步影响跨国宗族实践发展的?对于上述种种疑问,我们知之甚少。

基于此,笔者聚焦于一个拥有众多海外华侨华人且组织形态正呈现跨国化的宗族——广东五邑坪县坎镇的薛氏。五邑薛氏是一个已有700多年发展历史的中国传统宗族。目前,薛氏宗族在海内外共有8万多人,其中在祖籍地有4万人,有六成以上分布在坎镇的106个自然村,是坎镇的两大宗族之一。在北美、东南亚以及港澳地区有4万~5万人。^[8]海外薛氏在宗亲人数较多的聚居地纷纷成立了宗亲社团。这些海外(境外)宗亲会^①与境内宗族在文化上具有同构性,是其在境外的延伸。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在组织形态、成员关系以及运作模式上与传统宗族有着很大差别。这些境外宗亲会与境内宗族之间以侨汇为物质支撑,以族刊《伦德月刊》互通音讯,最终形成了

^① 由于有些宗亲会分布在港澳地区,因此后面都将其统称为“境外宗亲会”。在海外华人社会,许多宗亲会已经发展成为淡化血缘关系的同姓团体。但境外薛氏宗亲会的成员目前仍然是广东五邑薛氏及其后裔,总体上成员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宗亲关系。

“跨国宗族”。本文将这些境外宗亲会与家乡本地宗族及其相关成员在宗族事务上的跨国社会实践视作“跨国宗族实践”。笔者将采取跨国多点民族志^①的方法，对分布在不同地域的薛氏族人进行深入实地调查。^② 本文将以旧金山、香港与坎镇本地的薛氏宗亲会及其相关组织为重点，从互补与竞争的视角，具体探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薛氏宗族及其宗亲成员是如何在一个跨国空间内展开宗族实践的，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宗族实践的发生机制、发展过程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二、同盟圈的建立与圈际矛盾

资源互补的侨乡本地组织与境外宗亲会处在一个拥有相同的奖罚制度与文化体系的“共同体”中，这为跨国宗族实践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华侨华人为家乡宗族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如修建祠堂、祖坟、捐资各种宗族活动等）；而家乡则对这些热心家乡族务的宗亲提供社会地位补偿，形成“馈赠——补偿”的同盟关系。^[9] 然而，要想获得稀缺资源的侨资或社会地位的满足，往往需要与拥有同质资源的其他宗族组织进行竞争。这进一步引发了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薛氏宗族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互补与竞争的关系。

（一）侨资不均衡分配与同盟形成

在海外族人的倡议下，薛氏图书馆于1925年建成，后历经政治动乱而停办。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逐步落实侨务政策，移居香港的薛氏宗亲薛潮荫等人趁返乡之际，向县政府提出“复馆”的请求并获批准。随后在世界各地薛氏宗亲的大力奔走及筹募资金的努力下，图书馆得以于1982年复办。薛氏图书馆是以公益事业名义成立的本地宗族组织，实际上发挥着宗祠委员会的功能，如管理本地宗族事务、提供宗亲交流的场所、举办各种宗族活动、联系海外宗亲等。图书馆会视不同场合在“薛氏图书馆”与“坪县坎镇薛氏伦德堂”（也即宗亲组织）这两种身份之间变换。这种双重身份在“搭建侨牌，吸引外资”的名义下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许与认可。^[10]

图书馆在1988年之前一直是海外薛氏宗亲的捐资重点，其中以香港宗亲会和旧金山宗亲会贡献最大。然而，1988年薛氏宗亲筹资成立伦德中学^③，侨资分配结构出现重大变动，从而导致不同区域宗族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伦德中学成立初期所有基础设施均由薛氏宗亲捐资建成。北美的薛氏宗亲也曾积极参与筹款，但后来发生财政上的纠纷，北美宗亲在资金上“撤出”。与此同时，毗邻家乡的香港宗亲则担负起大部分筹款及建校的任务。因而伦德中学建校的筹款委员会设在了香港，并成为日后校董会的前身。

薛潮荫和薛留国是香港宗亲会的核心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在香港甚至家乡的宗亲中形成相当的权威，是与他们在宗族外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密切相关的。薛潮荫从事生意，经济基础雄厚，是整个薛氏宗亲的元老级人物。由于他对伦德中学和图书馆的捐资，因而在族内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而薛留国则是高级工程师，在香港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不仅设计了伦德中学的大部分教学楼，还给予了财力上的支持。而且由于薛留国在建校时年纪尚轻，建校的许多具体事务是由他具体操办的。香港宗亲会对伦德中学无论从财力、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巨大，也使伦德

① 跨国多点民族志指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对与某一专题或事件较为紧密相关的多个观察点进行田野调查。这种调查不局限于某一具体社区，而是让调查和分析跟着研究所要聚焦的人、物、话语、象征、生活史、纠纷、故事的线索或寓意走。参见 George Marcus,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4, 1995.

② 田野调查于2010年9—12月、2011年1—4月在广东江门坪县进行，于2011年12月、2012年1—2月在美国洛杉矶、旧金山完成。本文的所有调查均采用粤语进行。

③ 伦德中学自成立开始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境外宗亲的捐资，也在联系世界薛氏上起着重要作用。此外，伦德中学在校内专门设立了可供祭祖的地方，港澳台地区以及各个国家的薛氏每年都会到校内缅怀先祖。伦德中学在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招收薛氏子弟，因此，不能简单将伦德中学视作普通的教育机构。

中学成为香港薛氏宗亲重要的捐资对象和实现“社会地位补偿”^[11]的舞台。就如校长薛杰斌所说“香港的宗亲主要都把心血放在了伦德中学上。”^[12]香港宗亲会与伦德中学基于资源互补的原则逐步形成了制度化的联系网络。这个同盟圈在建立初期是相对开放的。伦德中学一直与其他境外宗亲会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同时，香港宗亲会也继续一如既往地支持图书馆。

薛氏图书馆对伦德中学的成立刚开始持积极的态度，毕竟此举增加了族内子弟就近读书的机会。而且薛氏图书馆中的不少成员包括主任薛良杰都曾是伦德中学的教师，与伦德中学渊源颇深。伦德中学与图书馆也一直秉持共同发展的理念。时间过去几年，由于伦德中学的发展需要源源不断且大量的资金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分薄了薛氏图书馆所接收到的侨资，使图书馆迫切需要寻求其他经济来源以支撑自身的发展。

北美宗亲会虽偶尔支持伦德中学，但由于学校耗资巨大，很多财力不如香港宗亲的北美宗亲转而将侨资投入到了图书馆，旧金山宗亲会元老^①薛参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20世纪90年代，薛参德先后将60多万元人民币投入到了图书馆及图书馆所主导的宗族活动中。基于馈赠——补偿的准则与规范，薛氏图书馆在其出版的侨刊《伦德月报》^②上多次登载了薛参德及旧金山宗亲会回报桑梓的事迹与相关照片，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在侨资供给与地位补偿的互动过程中，旧金山宗亲会与图书馆之间的同盟关系初步建立。

（二）圈内关系的巩固与圈际对立

同盟圈的建立是拥有异质资源的组织之间互动的结果，然而却可能带来圈际之间的对立，同盟圈圈际的对立反过来容易导致同盟关系的加强并使同盟圈进一步走向封闭。

《伦德月报》对于薛参德以及旧金山宗亲会的频繁报道最终引起了香港薛氏宗亲尤其是薛潮荫的反感。他直指薛氏图书馆主任良杰是“拍马屁”。良杰为此感到很委屈“确实是旧金山（宗亲）在建纪念园、侨刊、图书馆方面出力比较大，所以就赞扬他们多一点。没理由人家做了贡献不表扬的。”^[13]薛潮荫的指责并非没有根据。笔者查阅了1995—2008年间的《伦德月报》，虽然也有报道薛潮荫、薛留国等人对于族务的贡献，但很多时候是一笔带过，极其简略；而对于薛参德的捐资及受市政府表彰的事迹则往往会将相关照片登在侨刊的封面或背面，报道内容也更为详尽，其中不乏赞美之词。从《伦德月报》历年聘请的顾问^③情况来看（见图1），1990—1992年，北美宗亲在担任顾问的境外宗亲中所占比例有了大幅提升，并在1992年后一直保持在45%左右；而与此同时，香港宗亲所占的比例一直持续下降。这客观上反映了图书馆与北美宗亲的关系不断得到强化，而与香港宗亲的关系则逐渐疏远。

同时，北美宗亲对于香港宗亲会长期主导伦德中学的发展也表示了不满。作为北美最具经济实力的宗亲社团——旧金山伦德堂提出，校董会应交由薛氏图书馆接手管理。尽管图书馆方面为了息事宁人没有将此事真正落实，但此举为香港宗亲会与旧金山宗亲会之间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旧金山宗亲会与图书馆、香港宗亲会与伦德中学之间的制度化网络逐步巩固，并渐渐陷入两个同盟圈彼此排斥甚至敌对的困境。对于彼此主导的族务活动不给予

① 在许多宗亲会里，元老往往是由曾任多届宗亲会主席或会长，但年事已高不宜从事具体事务的长者担任，更多是一个名誉而不具有实际职权。但由于元老德高望重，在宗亲会中仍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以及决定权。而主席一般比会长的职位要高。

② 《伦德月报》于1924年创刊，后多次停刊，1989年复刊后每期印数两千册，一年四期，寄往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泰国、香港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个宗亲会所。刊中多见到各种“表扬信”，内容主要为颂扬回乡热心捐赠者的美德。因此，《伦德月报》也成为不同区域的宗族组织竞相进行比拼的舞台。

③ 《伦德月报》所聘请的顾问往往是由在宗族内部享有一定经济实力以及德高望重且对图书馆贡献巨大的宗亲担任。顾问不仅是名誉职位，实际上还扮演监督图书馆及坎镇本地宗族日常事务的角色。因此，从《伦德月报》聘请顾问的情况可看出其与北美宗亲会、香港宗亲会的互动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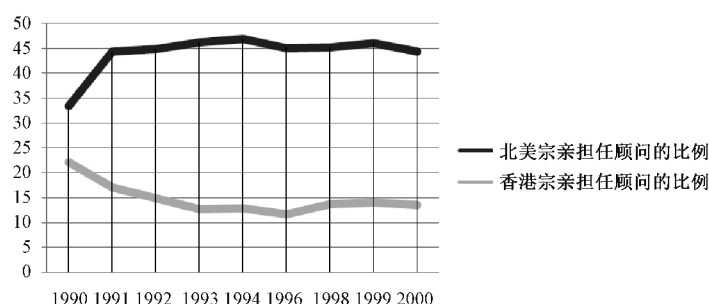


图1 《伦德月报》聘请北美及香港宗亲作为顾问的情况（1990—2000）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1990—2000年的《伦德月报》。《伦德月报》一年出四期，为了简化数据，每年只抽取一期。虽然有某些年份（1995、1997）及期数的缺失，但数据仍然反映了历年的大体趋势。

重视或干脆缺席这些“互不给面子”的举动加剧了两个同盟圈之间的误会与分歧。每年清明节，薛氏图书馆都会以伦德堂的名义组织世界范围内的宗亲回乡祭祖。这种祭祀活动与家庭内举行的祖先崇拜不同，一方面强调宗族间的平等与团结，但另一方面体现的是宗族内各个组织及成员权力和地位的分化，对宗族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人更能在祭祀仪式上担任主角。^[14]基于旧金山宗亲会对图书馆做出的贡献，图书馆在拟定祭祀活动时以旧金山宗亲的时间作为首要考虑。这再次引起香港宗亲会的不快，认为图书馆此举是受到了旧金山宗亲会的“指使”。

可见，香港与旧金山的薛氏宗亲在对伦德中学与薛氏图书馆的侨资投入不均衡，导致各自同盟圈的形成；而作为社会地位补偿供给者的中学与图书馆都试图用声誉资源回馈给同盟圈内部的“盟友”，进一步引发两个同盟圈之间的对立：不仅图书馆与香港宗亲会之间矛盾丛生，而且依靠香港宗亲会的伦德中学也与图书馆渐行渐远。

三、跨越同盟圈的地位竞争

在同盟圈内部，异质宗族组织之间虽可以基于“馈赠——补偿”模式获得各自需要的资源，但同盟圈的封闭性却进一步限制了资源获得的数量与范围。在这种背景下，薛氏宗亲试图跨越各自同盟圈的界线以获得更多侨资与声誉资源。

（一）争夺话语权与安插“眼线”

有研究显示，早期侨乡宗族的权力核心已经从在乡族长转向了海外侨领。^[15]海外华人在宗族活动中的话语权与决定权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恢复，甚至在“侨牌”的名义下表现得更为明显。^[16]对海外薛氏宗亲来说，争夺在侨乡宗族中的话语权实际上是他们实现社会地位补偿的重要方式之一。尽管香港宗亲可以通过捐资伦德中学来获得声誉，但由于图书馆在整个世界薛氏宗亲网络中所处的特殊位置，掌握着赋予宗亲声誉资源的话语权，因此香港宗亲会决定在图书馆内“安插”自己人，试图重新树立在图书馆的权威地位。

2001年，薛潮荫将堂弟薛启中和同族兄弟薛光汉推荐进图书馆工作。同时，薛潮荫借此优势，不遗余力地介入到图书馆的日常事务中去。例如，有一次，图书馆讨论是否要砍图书馆前面的两颗南洋杉。薛潮荫通过薛启中与薛光汉很快知悉此事，并对图书馆施加了压力，要求将这两颗树砍掉，理由是树太高了会压塌图书馆的建筑。最后图书馆出于平衡的目的，把这两颗树砍至树腰。2005年，第六届世界伦德联谊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作为承办方的加拿大宗亲会邀请薛良杰代表薛氏图书馆参加。薛良杰在加拿大的所有费用由一位老华侨承担，但旅行费需自行解决，图书馆中的大部分人同意由图书馆的公共开支来报销路费。但这个动议马上遭到了香港宗亲会的干涉，负责报销的图书馆出纳薛启中和会计薛光汉在香港方面的授意下不予报销。这种做法引起了图书馆内

部与薛良杰交好的成员的抗议。最后路费还是在瞒着香港宗亲会的情况下报销的。

薛潮荫等香港宗亲不仅加大了对图书馆的控制，还在许多重要的族务活动中将他看不顺眼的薛良杰等人边缘化。2005 年是薛氏图书馆成立 80 周年，世界薛氏宗亲计划于同年 10 月在图书馆举行纪念大会。由于相比薛参德等北美宗亲有着近距离的优势，薛潮荫试图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掌握图书馆的决策权，以此来排挤北美尤其是旧金山宗亲。薛潮荫极力撇开亲旧金山宗亲会的薛良杰，在图书馆内找到了一个“自己人”薛明来主持和筹备相关活动，从而顺利争取到图书馆 80 周年纪念活动的组织权。薛潮荫因此得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大肆修改整个会议程序。薛参德及其夫人为纪念图书馆成立，捐款 20 万元在图书馆的东侧建了一幢二层高的展览室，原本计划在会议期间举行捐赠仪式，但被薛潮荫等人临时取消。不仅如此，薛潮荫等人还反复修改大会的举办时间，导致没有足够时间通知远在美国的旧金山宗亲。2005 年的庆典活动，与图书馆关系密切的旧金山薛氏伦德堂竟没有一人来参加。此次会议是香港宗亲会争夺地位的一次“胜利”，整个大会都显示了薛潮荫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在世界薛氏中的显赫地位。

薛潮荫等香港宗亲对图书馆的介入是比较有效的：从 2002 年开始，担任《伦德月报》顾问的香港宗亲从原先的不到 15% 上升到了 19% 左右，并一直持续至 2009 年，直至 2010 年才有所下降。而同时，北美宗亲担任顾问的比例已在短短数年间下降到了 40%。这一方面反映出北美宗亲在图书馆的影响力下降，但另一方面北美宗亲担任顾问的绝对人数仍然高于香港宗亲，这虽与北美宗亲本身人数上要多于香港宗亲有关，但也可以看出香港宗亲并未完全取代北美宗亲在图书馆中的影响力，图书馆的决策权仍然部分掌握在与旧金山宗亲会交好的侨乡本地宗亲成员手里。可见，要想跨越自己的同盟圈来与对方同盟圈内部的同质组织竞争是存在难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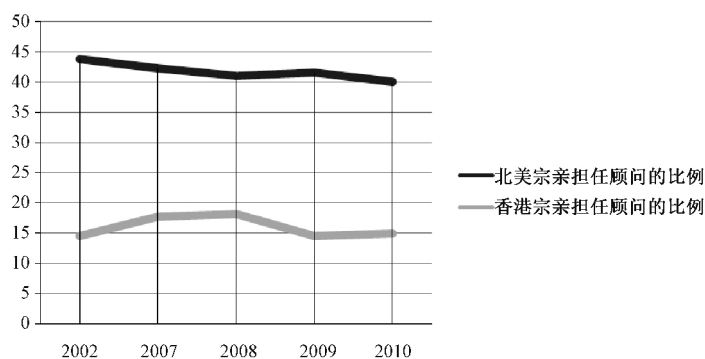


图2 《伦德月报》聘请北美及香港宗亲作为顾问的情况（2002—2010）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 2002—2010 年的《伦德月报》。而 2003—2006 的数据缺失，有些是找不到原刊，有些则是因为刊内未有登载聘请的顾问名单。根据调查情况，2003—2006 年之间各地宗亲会的人员变动并不大，因此数据仍然反映了历年的大体趋势。

（二）侨资的重新分配与矛盾加剧

与薛潮荫想重新树立在图书馆的社会声望相似，薛参德在图书馆 80 周年庆典之后，试图通过捐资 50 万人民币给伦德中学来扩大薛氏宗族内部的影响力。令人意外的是，此事很快就演变成了激化各方矛盾的导火索。伦德中学自成立以来的日常开支是由设立在香港的伦德中学校董会管理的，因此薛参德的捐款实际上是由香港宗亲会负责统筹的。但香港宗亲会与校董会并未按照薛参德的意愿修建运动场，而是将资金投入到了设备购买上，并且也未事先知会薛参德。尽管伦德中学通过不同场合解释了这笔钱用于何处，但还是无法平息旧金山方面的不满。2008 年，第七届世界伦德联谊大会与伦德中学成立 20 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坎镇举行。在伦德中学 20 周年庆典上，旧金山的一位与薛参德关系密切的老华侨薛锦瀚在会上质问包括以薛潮荫、薛留国为代表的

香港校董会将薛参德的捐资用于何处。双方为此争执起来。此事过后，香港与旧金山两地宗亲会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

正如上面故事脉络所展示的，各方均试图跨越自身的同盟圈而与对方同盟圈的异质组织建立关系，以求获得在宗族内部更为有利的位置。但跨越同盟圈进行地位竞争未必会立即带来同盟圈之间的和解，反而很可能引起对方同盟圈同质组织的排斥以及异质组织的反弹，导致同盟圈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进一步扩大化。

四、跨国宗族内部的和解

如上所述，同盟圈圈内的馈赠——补偿规范的遵行与同盟圈圈际之间的地位竞赛很大程度上引导与促进了跨国空间下形式多样的宗族实践。而跨国宗族实践的繁荣发展有时也为宗族内部矛盾的缓解提供了契机。

（一）圈内权力格局的变动

2009年，薛潮荫在参加完伦德中学开学典礼后，突然患病离世，随后薛参德成为世界薛氏宗亲中最德高望重的元老。这使世界薛氏宗亲网络的权力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

薛潮荫去世后，香港宗亲会以及伦德中学的校董会主要的权力核心由薛留国、薛鸿建以及薛熙群构成。薛留国任香港宗亲会主席，但年事已高，早有淡出族务的意向。薛鸿建担任香港宗亲会会长与伦德中学校董会主席，并准备接任成为香港宗亲会的主席。薛熙群则担任校董会的名誉会长。薛鸿建与薛熙群二人的活动范围并不固定于香港：薛鸿建虽是香港宗亲会的成员，但已入了加拿大籍，频繁往来于香港与加拿大；出生于香港的薛熙群也入了美国籍，全家定居在洛杉矶。他们的多元身份本身就为与北美尤其是旧金山宗亲会之间的和解提供了良好的前提。而在图书馆内部，曾是“亲港派”的薛启中、薛光汉、薛明由于身体不适也逐渐退出图书馆的日常工作。

随着香港宗亲会、伦德中学校董及其支持者的实际影响力下降，失去了强有力支撑的伦德中学开始试图通过释放善意来修复与以薛参德为代表的旧金山宗亲会的关系。2010年底，伦德中学校长薛杰斌的堂叔、洛杉矶伦德公所元老薛朝剑访问伦德中学。薛杰斌给予了热情接待，并提出，希望能够通过与薛参德交好的薛朝剑向薛参德就捐建体育场之事道歉，试图通过薛朝剑从中修补与薛参德曾经破裂的“馈赠——补偿”关系，甚至提出薛参德捐资的款项可以派其信任的人打理而绕开香港宗亲会。薛杰斌还以提高薛参德地位的名义而向其施加道德压力，也即“薛参德作为宗族内部地位最高的前辈不在薛氏宗族捐建的学校中留名是说过不去的”。

薛朝剑既是薛杰斌的堂叔，与香港校董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又是北美华人，与洛杉矶、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纽约等地的宗亲有着相似的经历。多重身份使他在此次学校宿舍楼筹款中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受薛杰斌委托，薛朝剑回洛杉矶后，特地前往旧金山拜会薛参德，并做了一些化解恩怨的解释工作。薛朝剑还在北美各种宗族活动上，将伦德中学筹募宿舍楼款项的消息告知北美的宗亲，此事很快成为世界薛氏宗亲关心的焦点议题。

（二）圈际对立的缓解

2011年10月，第八届世界伦德联谊大会由旧金山宗亲会承办。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宗亲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在大会期间，薛氏宗亲专门就筹建伦德中学新宿舍事宜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校董会成员介绍在建校筹款部分时着重提到薛潮荫到北美各地区去筹款的过程，强调北美宗亲在学校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尤其提及薛参德对学校的50万元捐助，且已将薛参德的名字刻在了学校的教育楼处。2011年4月，笔者在伦德中学调查时并未发现有此刻名，可见是学校为了突出薛参德对学校的重要贡献、争取薛参德的支持，特意在来美筹款前临时立的芳名碑。

随后，薛朝剑作为伦德中学校舍临时筹建委员会主席上台介绍学生宿舍扩建详情、筹款额

等，并公布了已捐款的宗亲的名单及数额。他随后将筹募资金的任务分摊给每个宗亲会。在旧金山宗亲会表态时，薛参德由于口头表达吃力，委托信赖的一位老华侨薛银汉起身表态“我现在是代表元老参德宗长，他说他认捐两万美金（掌声热烈）……而我个人呢，就捐 5000 美元进去，后面我们宗亲会筹到多少呢，我们到时再报告。”^[17] 鉴于薛参德捐建体育场之事，不少宗亲尤其是旧金山宗亲对此次筹募资金的去向以及使用情况仍抱有疑虑，薛朝剑未等有质疑就主动向校董会提出监督与刻名的要求，极大地弥补了伦德中学之前声誉补偿工作不到位的缺憾。最后薛朝剑还专门请薛银汉代表薛参德宣读致谢词“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的校董会，希望能够通过大家捐助，使得伦德中学发展得越来越好。让我们的子弟都能够享受到好的教育。”

筹建伦德中学新建宿舍会议在基本达成共识、友好的氛围下结束，标志着长期持续在薛氏宗族内部的宗族矛盾暂时得到了和解。跨国宗族内部矛盾的缓解更多依赖于宗族内部各个同盟圈的权力格局变动以及各方对于和解的需求程度。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同盟圈中，其中一方由于各种因素实力突减，很可能带来各方对于和解需求的增加，从而使曾经紧张的圈际关系得到缓和。

五、结论与讨论

历史上，华南地区有不少宗族因房支裂变，在富裕程度、社会影响和成员增殖等方面呈现不均衡，导致宗族内部关系相对紧张。^[18] 然而，在现代背景下，许多跨国宗族内部出现了由华侨华人及其组织机构所主导的精英群结构，地位以及声望的高低已不再由传统的宗族辈分体系以及房支的政治经济势力来确定，个体在某个宗族组织或宗亲会中是否具有权威，某宗亲组织能否获得在整个跨国宗族中的主导权，均取决于其对家乡和宗族的贡献。^[19] 无论是用以评估贡献多少的侨资还是回馈贡献的声誉资源都是稀缺的，均需个体与组织通过竞赛获得，这使跨国宗族内部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因此，当代跨国宗族内部矛盾更多是由各利益主体对稀缺资源的争夺所导致。

在跨国宗族实践中，互补与竞争这两种关系往往是交叠在一起的，由此形成跨国宗族内部错综复杂的同盟圈圈内关系与圈际关系，共同影响了不同国家、区域宗族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跨国宗族实践的开展与运作。这种互补与竞争既是跨国宗族内部出现的不同成员及组织的经济与社会分化的产物，也进一步成为维持与加强跨国宗族形态的不同区域、国家的宗族成员及组织对于宗族的归属感与向心力的重要动因。资源互补的家乡宗族组织与境外宗亲会之间较容易建立起“馈赠——补偿”的同盟关系；而拥有同质资源的组织（如家乡本地组织之间、境外宗亲会之间）则易于形成竞争关系。同盟圈带来的间接后果则是圈际之间的对立，圈际对立又很可能导致同盟圈出于对圈内利益的维护而进一步走向封闭。

尽管不少组织及个体都试图跨越同盟圈寻求更多的圈外资源（无论是侨资还是声誉地位），但这种跨越同盟圈的地位竞争很可能会面临来自对方同盟圈同质组织的排斥以及异质组织的反弹，从而使跨国宗族内部的矛盾加剧。但当跨国宗族内部出现权力格局变动，很可能导致各方对于和解需求的增加从而使矛盾得到缓解。不过，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由于资源稀缺依然存在，竞争与矛盾始终存在于宗族内部。这种资源的互补与竞争不仅维持与加强了跨国宗族形态的不同区域、国家的宗族成员及组织对于宗族的归属感，也进一步导致跨国宗族内部出现经济与社会分化。正是在上述既有同盟又有竞争的错综复杂的宗族网络中，侨乡宗亲组织以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宗亲组织及其个体才得以呈现出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跨国宗族实践。

〔注释〕

〔1〕〔英〕莫里斯·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8页；〔美〕鲁比·沃森《兄弟并不平等：华南的阶级和亲族关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James Watson, *Emigration and Chinese Line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3] Xiaotong Fei, "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46, Vol. LII: 1-17.
- [4]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 Vol. 33, 1966.
- [5] 宋平 《承继与嬗变: 菲律宾当代华人社团研究》,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范可 《旧有的关怀、新的课题: 全球化时代里的宗族组织》, 《开放时代》2006 年第 2 期; 陈达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8 年, 第 138、282~286 页; 瀚川昌久 《族谱: 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 邓玉柱 《侨乡宗族研究——以开平县赤坎镇司徒氏、关氏为中心 (1912-1949)》, 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2011 年; Yuen-fong Woon,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outh China: Chinese and the Guan Lineage of Kaiping County, 1949-87",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18, June, 1989, pp. 324-344.
- [6] 刘朝辉 《改革年代侨乡社区的宗族组织与政治过程》, 《思想战线》2014 年第 3 期; 吴瑞珠 《境外华人和泉州南音的发展》, 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主编 《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 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出版, 2006 年; 范可 《“海外关系”与闽南侨乡的民间传统复兴》, 杨学滢编 《改革开放与福建华侨华人》,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麻国庆 《宗族的复兴与人群结合——以闽北樟湖镇的田野调查为中心》, 《社会学研究》2000 年第 6 期。
- [7] 曾玲 《华南海外移民与宗族社会再建》, 《世界历史》2003 年第 6 期; 吉原和男 《泰国华人社会的文化复兴运动——同姓团体的大宗祠建设》,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3 期; 傅利曼 《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 台北: 正中书局, 1985 年; 曾少聪 《漂泊与根植: 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110~113 页; 曾玲 《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 年。
- [8] 参见《薛氏宗族研究》(未刊资料) 以及薛氏图书馆的内部统计资料。
- [9] 陈杰、黎相宜 《道义传统、社会地位补偿与文化馈赠——以广东五邑侨乡坎镇移民的跨国实践为例》, 《开放时代》2014 年第 3 期。
- [10] 参见《坪县侨务志》(1990 年), 内部资料, 第 25 页。
- [11] 黎相宜、周敏 《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 华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究》, 《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 3 期; 黎相宜、陈杰 《社会地位补偿与海外移民捐赠——广东五邑侨乡与海南文昌侨乡的比较分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
- [12] 2010 年 11 月 17 日, 笔者在伦德中学对校长薛杰斌的访谈。
- [13] 2010 年 11 月 3 日, 笔者在坪县坎镇薛氏图书馆对图书馆主任薛良杰的访谈。
- [14] 参见 [英] 莫里斯·弗里德曼著 刘晓春译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第 114 页; [美] 鲁比·沃森 《兄弟并不平等: 华南的阶级和亲族关系》,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 第 46、54 页。
- [15] 王连茂 《明清以来闽南海外移民家庭结构浅析》, 陈志明、张小军、张展鸿编 《传统与变迁: 华南的认同和文化》,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0 年。
- [16] Shu-min Huang, *The Spiral Roa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 [17] 2011 年 10 月 30 日, 笔者在旧金山唐人街附近希尔顿酒店对伦德中学校董会的采访笔记。
- [18] 参见 [英] 莫里斯·弗里德曼著 刘晓春译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第 87 页; 瀚川昌久 《族谱: 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 第 94 页; 王连茂: 《当代侨乡家族的“迎祖”活动》, 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主编 《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 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出版, 2006 年。
- [19] 曾玲 《华南海外移民与宗族社会再建》, 《世界历史》2003 年第 6 期。

[责任编辑: 密素敏]